

小时候，很少吃香蕉。那时候，香蕉这种南方水果，很少见在北京卖。偶尔有卖的，也吃不起，家里不富裕。记得第一次吃香蕉，是刚上小学不久，姐姐从呼和浩特到武汉出差，想买点香蕉，回来时路过北京，带给我和弟弟尝尝，转遍武汉三镇，只买到两小挂芭蕉，个头儿比香蕉小。姐姐见我弟弟吃时馋嘴的样子，背过身子悄悄抹眼泪。小时候不懂事，只顾着自己吃，不明白挺好吃的芭蕉，姐姐自己不吃，为什么掉泪？

香蕉和荔枝

肖复兴

第一次美美地大啖香蕉，是1966年的初冬，大串联到了广州，看见满大街到处卖香蕉，挂着的，堆着的，金灿灿一片，很是耀眼。记得非常清楚，只要5分钱一斤，这么便宜，便买下来，站在街头吃起来，弥补了小时候对它馋涎欲滴的亏空。

到北大荒的第一年春节前夕，大雪封门，无处可去。知青食堂里，有张我们自己做的简易乒乓球台，我和同学约好在那里打乒乓球，谁输一盘，谁到小卖部买一瓶罐头请客。谁想到，肉鱼罐头和其他罐头都卖光了，只剩下一种香蕉罐头。北大荒，哪里见过香蕉呀！能有香蕉罐头吃，也是美事。第一次离家那么远过年，乒乓球和香蕉罐头，让我们暂时忘记了对家的思念。我们一盘盘地打球，一次次蹬着没小腿肚子深的大雪去小卖部，一瓶瓶地买罐头，最后把小卖部所有的香蕉罐头买光。到现在还记得，是那种铁皮罐头，一根香蕉切成两半，一共四瓣香蕉，直杆杆地立在糖水中。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多的香蕉，肚子撑得，以至于晚上的年夜饭，最好吃的杀猪菜，都吃不下，放屁都是香蕉味儿的。

那时候，弟弟在青海油田，我从北大荒第一次回北京探亲，和弟弟约好，一起先到呼和浩特姐姐家会师。我和弟弟、姐姐，都有好多年没见面了。那一阵子，流行厄瓜多尔大香蕉，比国产的香蕉个头儿长又粗。回北京前，在火车站和姐姐分别，姐姐买来一大挂厄瓜多尔香蕉，让我们带在路上吃。我立刻想起来小时候姐姐在武汉给我买来的芭蕉。

芭蕉和香蕉，串联起童年到青春漫长的岁月，让记忆中有情感清晰的对应物。

多年之后，我读到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小说《橘子》。他写第一次离家外

出打工的姐姐，有了一点微薄的工钱，买了几个橘子，火车路过小镇的岔路口，望见了站在那里等候为她送别的三个弟弟，使劲打开车窗，把橘子扔给弟弟。我想起了我的姐姐。

今年，姐姐九十一岁了。我和儿子都很爱吃荔枝。不过，我小时候，从来没有吃过荔枝，见都很少见。那时候，在北京，这种南方水果，比香蕉更稀罕，即使见到了，价钱比香蕉更贵。儿子小时候，夏天，北京街头的水果摊上，荔枝已经常见，他能够吃凉不管酸地随便吃了。说来可笑，我也几乎是那时候才开始吃到荔枝的。可以说，吃荔枝，我和儿子同步，但比儿子晚了三十多年。时代的步伐，就是这样在日常生活的变化中显现。小小的荔枝，映彻两代人的童年。

即使那时候我和儿子都吃到了荔枝，但都没有见过荔枝树。不知道荔枝挂在树上，是什么样子的，会不会和院子里枣树上结的月牙枣一样，一嘟噜、一嘟噜的？

那时候，我和儿子一起读前辈作家郭风先生的散文，看到他描写荔枝树的样子：“雨点敲打着远处一大群一大群相互依偎的绵羊似的荔枝林，那林梢仿佛在冒着白色的烟雾。”荔枝树，在郭风的文字里，在我们的想象中，一直都像那一群群依偎在一起的绵羊。

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夏天，我到广州，才第一次见到荔枝树。确实是像相互依偎的绵羊那样密集，但比绵羊要高大。累累的荔枝，小星星一样，密集在枝叶间，真是一嘟噜、一嘟噜的，红艳艳的很好看。我摘下几片荔枝树叶，带回家给儿子。那时候，他刚上小学一年级，积攒各种树叶做标本。两年前，他还很幼稚地将吃过荔枝剩下的核儿，种在花盆里，梦想有一天能够发芽长大，结出荔枝来呢。

2019年初冬，儿子第一次来到广东，才第一次见到荔枝树，比我晚了三十年。可惜，不是结荔枝的季节，没能见到荔枝一嘟噜、一嘟噜挂满枝头的情景。我想起小时候他把荔枝核儿种在花盆里，梦想长成荔枝树的笑话。他谈起郭风先生笔下像一群群依偎在一起的绵羊的荔枝树，树梢在雨中像冒着白色的烟雾。

浙江美术馆的金农特展，呼啦啦来来去去很多人，连我都收到两份朋友寄来的手信，是美术馆方做的周边，金农写的“此生不爱结婚”。这当然不是他的原句，因为我恰巧看过那幅画，是一盆菖蒲——金农顶顶偏爱的植物。这幅画的珍贵，乃是金农为菖蒲过生日（四月十六传说是菖蒲生日），特地用元代的墨来涂画。他给菖蒲找了一个“石头”新娘来作配，说“写真特为祝长生，一盏清泉当清醪。行年七十老未娶，南山之下石家女，与郎作合好眉妩。”第二天，他自己又替“蒲郎”作答，拒绝了这门亲事：“此生不爱新结婚，乱发蓬头老瓦盆。莫道无人充供养，眼前香草是儿孙。”

金农当然是结过婚的，也有过女儿。可是女儿海珊远嫁天津，不幸难产而死，陪女儿一起生活的老妻要南归，金农需要四处求售字画筹措资金，才得以让老妻回家。不久妻子郁郁而终。他“洁身独处”，虽然曾经蓄一哑妾，但不久下堂，金农从此伶仃一身，“眼前香草是儿孙”，说的是菖蒲还是金农，已经无从分辨了。

整个大展中，我还是最喜欢那幅故宫博物院的《月华图》。过去文人画月亮，月亮往往只是背景：楼台、水岸、小舟、梅枝，月不过是借来烘托情味的一盏灯。金农偏偏不肯，他让月亮成了唯一的主角。初看，你几乎不敢相信这是清人的笔

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于一九三八年。昆明。年届28岁的钱锺书刚刚从欧洲留学归来，即被联大破格聘为外文系教授。钱锺书与诸位好友如沈从文、滕固、顾颉刚、施蛰存、傅雷、林同济、梁宗岱、萧乾、冯至、庞薰莱等，都初识于昆明。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下午，钱锺书在青云街169号沈从文寓所与吴宓、林同济夫妇、梁宗岱、萧乾、冯至、顾宪良、傅雷

金农的月亮

李舒

墨：没有我们熟悉的那种程式化文人月色，没有山，没有树，没有人，也没有什么可供寄托的风景。只有月亮本身，圆而静，光华流转。阴影的层次，充分借了水墨在宣纸上自然洒开的力量；外围微微带暖的淡色，又反衬得月色越发皎洁。

画上也没有多少字，只有款识：“月华图画寄墅桐先生清赏。七十五叟金农。”墅桐先生是张君墅，金农的好友。画这幅画时，金农已经七十五岁。到了这个年纪，他几乎失去了人世间一切可倚仗之物，剩下的，只是一轮月亮。

可是也正因为如此，这个月亮才格外干净。我们中国人看月亮，总喜欢给它添些东西。小时候说月中有桂树，有嫦娥，有月兔，有吴刚；长大后又往月亮里安放故乡，安放相思，安放团圆，安放许多不能直说的心事。月亮于是成了一个很热闹的地方，仿佛只要抬头看月，就有人陪着你，故事陪着你，旧梦也陪着你。

其实月亮里什么也没有。没有月兔，没有嫦娥，没有谁在广寒宫里替人守着孤寒的长夜。月亮只是月亮，荒凉、沉默、冷冷地亮着。金农到晚年，大约已经明白了这一点，所以他不再借月抒情，不再借月寄慨，也不再给月亮附会什么

热闹的传说。他画的，是月亮本身。也正因为画的是月亮本身，这幅画才有一种近乎残酷的坦率：把一切装饰都拿掉，把一切陪伴都拿掉，把一切人间的故事都拿掉，最后留下来的，不过是一个人和他眼前的景。

而人活到最后，真正要面对的，也正是这个。

孤独并不只是老年的境况，不只是丧妻失女、朋友零落之后的不得已。孤独几乎是人的本质。少年时我们靠热闹遮掩它，中年时靠事务麻痹它，到了老年，热闹散了，事务尽了，才发现它本来一直都在。所谓回到本真，也许并不是什么顿悟，不过是终于承认：人生里那些被我们视作牢靠的东西，功名、眷属、知己、悲欢，原来都像月中的神话，是自己人自己添上去的影子。看似真切，到头来一一散去。

这样想来，金农那轮月亮，倒并不令人伤感，反而有一种透彻。因为他不再自欺了。没有亭台楼阁，没有泛舟湖上，没有对坐赏月的人，也没有嫦娥与玉兔来替人排遣寂寞。都没有关系。月亮只是月亮，人只是人。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，到最后还能守住心里这一点清光，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。

人当然是孤独的。可若能像金农这样，把热闹看尽，把虚妄放下，最后仍旧安安静静地望着那轮月亮，也许孤独便不再只是凄凉，而成了一种清醒。

我最爱金农的月亮。

钱锺书与沈从文

罗银胜

等一众好友茶叙畅谈。这是钱锺书与沈从文、傅雷等友人的初识。据《吴宓日记》：“四点陪岱访林同济夫妇于青云街67寓宅。旋同岱、济至青云街169宅，访沈从文，适邀友茶叙，客有萧乾、冯至、钱锺书、顾宪良、傅雷等。众肆谈至七点始散。”

而在此之前，钱锺书《起居注》记载了他与沈从文的通信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：“得季书、颢虞书、企康书、沈从文书，皆复。”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：“得宾四、从文、曾以灿、丸善书，得季四书，均即复。”

钱锺书在昆明应邀赴沈从文的寓所，参加社交活动，从此缔交。不过，钱锺书当时曾为文讽刺过沈从文，有过笔仗。

钱锺书的《冷屋随笔之四》（《说笑》）刊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的

稍觉不同，倒以为这种人还可爱。”

这里提到的“朋友某教授”，显然就是钱锺书。“稍觉不同”只是谦辞，“这种人还可爱”才是沈从文的真话：“至如真俗人，他自己并不以俗为讳，明本分，重本业，虽不曾读万卷书，使得心窍玲珑，却对于美具有一种本能的爱好。”赞完“真俗人”，沈从文笔锋一转，批评“假道学”与“真俗人”性情完全相反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，钱锺书和杨绛初到清华，一起进城看望沈从文、张兆和伉俪，受到款待。这是一趟“融冰之行”，杨绛有过解释：“因为锺书曾作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，觉得应该修好。”既然钱锺书、杨绛真诚修好，访谒旧雨；沈从文、张兆和冰释前嫌，款待老友。有趣的是，钱先生的妙论，多年后竟然成真：“真货色是从冒牌起的”，沈从文劫后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工作，撰写了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，成为“真道学”式的文物专家了。

沈从文的《真俗人与假道学》，发表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五日《中央日报·平民》副刊。文章开头直言：“朋友某教授，最近作篇文章那么说：‘世有俗子，尊敬艺术，收集古董，以附庸风雅’，觉得情形幽默，十分可笑。我的意见

一个人去上学

吉建富

小学放学，校门口人声鼎沸，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早早地候着，看到第三代出校门，老师还未喊“解散”，老人们已经蜂拥而上。

想起三十年前自己送女儿去上学。那时，我家住在与吴淞路交界的哈尔滨路，女儿上小学一年级由我接送，书包让她自己背。吴淞路是条主干道，车水马龙，川流不息，我有意识地告诉女儿，怎样观察红绿灯，怎样判断来往的行人和怎样避让车辆。

有一天早晨，我带女儿到弄堂口，正巧隔壁比她高一年级的同校邻居过来，她一个人去上学，与我女儿做伴。我不放心，悄悄跟在她们后面，在路口，隔壁邻家的女孩“资格老”，她吩咐我女儿：“快点，跟着这个阿姨一道走。”

数十年后，女儿为人母，前后生了两个女儿，我与太太“升级”外公外婆。等到大外孙女上小学，我给她讲妈妈上小学时，被外公逼着自己去上学的事。我是想“打提前量”。

在我的教育下，两个外孙女都是从三年级开始自己去学校，过马路根本不成问题。



夜光杯

小学放学，校门口人声鼎沸，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早早地候着，看到第三代出校门，老师还未喊“解散”，老人们已经蜂拥而上。

想起三十年前自己送女儿去上学。那时，我家住在与吴淞路交界的哈尔滨路，女儿上小学一年级由我接送，书包让她自己背。吴淞路是条主干道，车水马龙，川流不息，我有意识地告诉女儿，怎样观察红绿灯，怎样判断来往的行人和怎样避让车辆。

有一天早晨，我带女儿到弄堂口，正巧隔壁比她高一年级的同校邻居过来，她一个人去上学，与我女儿做伴。我不放心，悄悄跟在她们后面，在路口，隔壁邻家的女孩“资格老”，她吩咐我女儿：“快点，跟着这个阿姨一道走。”

数十年后，女儿为人母，前后生了两个女儿，我与太太“升级”外公外婆。等到大外孙女上小学，我给她讲妈妈上小学时，被外公逼着自己去上学的事。我是想“打提前量”。

在我的教育下，两个外孙女都是从三年级开始自己去学校，过马路根本不成问题。

2020年11月初的一天，满世界都是“11·11”的广告，好像眼睛一睁就有一辆购物车轰隆隆地向你驶来。老梅想，这辆车从何处来？要到何处去？它到底有多大？用什么来装满？你的钱包能装得下它吗？

老梅的父亲是个老会计，生前一直有记账的习惯。老梅虽然多年来一直记日记，但记账这事却是时断时续。那天，老梅决定用一种带着仪式感的方法来记自己的日常流水账，用的是一卷长五十米、宽五十厘米的卷纸，除了记录日常的开支，还把所有的票据一并粘贴上去，老梅的流水账就这样开始了，从2020年11月至今，第一个五十米长的卷纸筒已经用完，第二个也已经用了一大



双清图 (中国画) 汤兆基

半，展示开来可以摆满一个四十多平方米的客厅，这日记看上去就是壮观。

从那时开始，老梅开始认真地保存自己的每一张消费单据，只是现在网购多了，大部分都是电子支付，要想获取消费凭证还稍显麻烦。而这几年，老梅在国外生活的日子稍多了一些，去超市或是商店购物都会有纸质凭证，上面不仅列出了购物明细，还有具体的税金等金额，贴在纸卷上，不仅花里胡哨，也显得浩浩荡荡。老梅五年多的流水账，像是生活里的一幅长卷，让老梅看见自己的烟火气在随风飘荡。

在这个长卷里，生活中的细节被清晰地呈现出来，你可以由此看见生活的潮涨潮落，

之前维也纳的地铁单次票价是2.4欧元，今年都涨到了3.2欧元（约26元人民币），整个地铁系统涨价25%，让人清楚地看

流水的踪迹

老梅

到自己的钱包瘪了一下；华人超市里的一袋青菜（三棵），价格是3.5欧元，几根小葱就是2.5欧元，比起来，一袋一公升的牛奶也不过一欧元。怀乡本是一种蛋白酶的思念，但体现在流水账上却颇显在外之昂贵。

只要流水账的卷轴一拉，就能看见自己的生活流向，由钱包到流水账卷轴，移动得如此丝滑而不容置疑，让老梅平

时的惆怅和不懈有了清晰的落处，生活变得真切而实在，你的认真或是敷衍，都在这里被陈列得一目了然。这份流水账的卷轴里，记录着老梅的每一次消费，记录着老梅的所到之处，除了北京和老家常州，还有维也纳、巴黎、奥斯陆、里斯本、赫尔辛基、巴塞罗那……所过之处，点点滴滴都有痕迹。

流水的踪迹里，有情分也有收获，有日常里的每丝每毫，积攒起来，形成了老梅个人的微观经济，如此真实。因为有流水账，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呈堂证供，消费变得理性而舒展。老梅原本是个消费的不理性主义者，平时的大部分消费是买书和看各种演出，其他的

日常稍显简陋，成本太低，老梅有时会觉得自己欠了自己一些，自从玩了流水账，便时常买些小玩意儿哄哄自己，供自己一乐。

流水有踪，钞票有痕，流水账里时不时地会冒出一口气息来，冷冷暖暖的，像四季。老梅打定主意要记上十年的流水账，看看岁月和自己，究竟是谁饶过谁；看看十年里的自己是如何保持心理平衡的。流水是岁月，也是自己的风貌呈现，潮涨潮落，旦夕祸福，全在这一卷长轴中，纸上风云，老梅自己一呈现。

今日谈 请看下一组十日谈“老马路” 责编：郭影 变迁